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8年12月28日 星期四
农历戊午年十一月廿九 第11129号

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座谈会热烈响应三中全会号召

努力实现四化建设伟大祖国

坚信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表示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四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到会委员一致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全会在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杨静仁、钟惠澜、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孙超孟、程思远、朱镕基、胡子昂、蔡啸、荣毅仁、季方、胡厥文、孙承谔、孙晓村、胡子婴、许德珩、包尔汉等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热烈响应全会的号召，表示要为实现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蕴山副主席说，全会所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它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我表示热烈拥护。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团结的大好形势，解放思想，群策群力，为在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最近中美建交公报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祖国的统一是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共同的心愿。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有朝一日看到祖国的统一，在北京或到台湾会见当年的老友。

胡子昂副主席说，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它揭开了我国历史上新的一页。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举国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科学发达，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一句话，大大发展生产力，做到国强民富，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意愿，是中国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说，我们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最近已在成都、武汉召开了两次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把我们两会的工作活跃起来。工商界中有不少具有一定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

有许多有实践经验的特技人才，还有些人的亲属、朋友在海外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工商业，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积极响应全会的号召，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做好这方面的的工作，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钟惠澜委员在发言中指出，全会公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要在我国实行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全会强调这个问题，深得人心，这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蔡啸委员说，三中全会公报反映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台湾人民如果能读到三中全会公报，也会同我们一样高兴。常言说，每逢喜事想亲人。在这欢乐的时刻，我更加想念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全会公报中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这是祖国和人民对广大台湾同胞的殷切期望。我坚信，广大台湾同胞一定不会辜负祖国的这一殷切期望。祖国统一、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携手前进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程思远委员说，在这学习公报信心满怀，展望前程干劲倍增的时刻，我想对台湾的故旧讲几句话。历史要发展，人民要前进，祖国要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实践证明，凡代表人民利益者无不胜利，凡违反人民意愿者无不失败。希望故旧友好们应应包括祖国的广大希望，我们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前程似锦。他说，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希望逃亡在国外的达赖以及其他藏胞们认清形势，赶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各族人民一道，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新长征，把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建设好，使祖国早日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你们唯一光明的道路。十几年的经验教训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西藏只有统一在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才有灿烂的将来；西藏人民只有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幸福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走爱国道路，在力所能及及的范围内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些话我过去也说过，但是体会没有现在这样深刻，因此，我希望达赖和其他人也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这些话。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一贯的，那就是爱国一家。如果你们回到祖国来的话，党和人民一定会欢迎的，并会对你们进行妥善安排的，是能各得其所的。这一点，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请逃亡在国外的藏胞们要认真学习想一想，千万不能再错下去呀！应该回来同我们一起建设我们可爱的家乡——西藏，建设可爱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委员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代表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次全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更加坚信：我们的党英明正确，我们可爱的祖国大有希望，我们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前程似锦。他说，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希望逃亡在国外的达赖以及其他藏胞们认清形势，赶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各族人民一道，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新长征，把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建设好，使祖国早日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你们唯一光明的道路。十几年的经验教训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西藏只有统一在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才有灿烂的将来；西藏人民只有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幸福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走爱国道路，在力所能及及的范围内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些话我过去也说过，但是体会没有现在这样深刻，因此，我希望达赖和其他人也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这些话。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一贯的，那就是爱国一家。如果你们回到祖国来的话，党和人民一定会欢迎的，并会对你们进行妥善安排的，是能各得其所的。这一点，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请逃亡在国外的藏胞们要认真学习想一想，千万不能再错下去呀！应该回来同我们一起建设我们可爱的家乡——西藏，建设可爱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新华社北京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使参加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进一步懂得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深感作为专门执行法律检察任务的检察机关，对于健全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早日实现负有重要的职责。

下面是一些代表在一个座谈会上围绕民主与法制问题的发言：

检察机关要坚决同违法乱纪作斗争

张苏(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公报》指出了检察机关如何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展工作，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大增强我们做好检察工作的信心。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办理案件，应该象《公报》指出的那样“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反对凭“长官意志”办事。我们要按照《公报》指出的“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一原则办事。对于犯法者，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都要以法律为准绳给以惩处，坚决反对任何特权。

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流毒很深很广，直到现在，有些地方违法乱纪的情况仍然很严重。人民检察院主要坚决同违法乱纪作斗争。广大检察干部要有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革命精神，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人民民主。检察工作做得好，就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四化早日实现。

何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处长)：《公

报》指出，必须永远远距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这说出了我们广大干部的心里话。这对于发扬民主是一个有力的保证，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专案审查”，打击、诬陷干部，制造冤案、假案。《公报》指出，专案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颇多。我前几年在北京市法院工作，就曾接触到这样的案子：既不准法院的办案人看卷宗，也不准提审犯人，只是照着上面转来的专案组的结案材料写判决书，连刑期也是专案组事先定好的，实际上只是在法院办一个手续。这样做的结果，既剥夺了司法机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独立审判权，又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和上诉权。专案组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这是对法制的践踏，那里还谈得上法制的极大权威和司法、检察机关应有的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废除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也有利于健全法制。

人民的民主权利需要有法律来保障

马纯一(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社会主义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群众有了民主权利，有了当家作主的思想，敢于讲话，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粉碎“四人帮”后，群众中迸发出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人民的民主权利需要有法律来保障。有了法，群众知道怎样做是违法的，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自觉地同违法者作斗争。人民检察院是检察法律执行的专门机关，对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负有重要的职责。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使人民群众在这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勇于开罪于大干四个现代化。

郑士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制健全与否，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直接关系。林彪、“四人帮”破坏法制的结果，是坏人得气，好人受气，我们“立足于有，着眼于是”，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江苏已经复查的大量政治案件中，冤案、假案、错案就占百分之四十几。群众的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积极性了。我省射阳县新坝公社新潮九队，旱谷亩产一吨粮，是全省闻名的农业先进典型，但这个队的先进经验在本县不能推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射阳县的冤案、假案、错案多，复查工作进展迟缓，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群众心情不好，怎么会有劲头去学别人的高产经验呢？

关心农民利益 搞好年终分配

莱西县等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体现了三中全会公报精神

新华社编者按 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这对于调动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业迅速发展，关系极大。以下几个单位今年进行年终分配的作法，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精神。他们搞好年终分配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单位的基本经验，就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发扬民主，打破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精神枷锁，坚决取消过去那些在分配方面的不合理规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怕社员富裕，关心社员物质利益。他们这样做了，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取消不合理规定
增加社员的收入

中共山东省莱西县委最近作出决定，取消前几年在年终分配中“要把农村社员的全年分配限制在一百五十元钱之内”的不合理规定，使全县增产的社队做到增产增收，社员多劳多得，受到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拥护。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莱西县的农业收入和社员分配水平很不平衡。县委一度认为，如果不对富队加以限制，势必出现“两级分化”。因此，县委规定富队每个社员的全年收入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元。这项规定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莱西县委认识到限制社员收入分配的政策，是受了“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他们说：要缩小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只能用帮助穷队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决不能限制富队增加收入。

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前提下，不应以任何借口限制社员的收入。县委知错就改，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宣布取消这一错误规定。

莱西县委新的决定，使原来一些富裕队又在开始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新门路。一些收入较低的社、队也受到了鼓舞，决心加快前进的步伐，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尽快地增加社员的收入，赶上或超过先进队。

提高贡献大的生产队的社员口粮标准

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公社在今年口粮分配中，克服平均主义，适当提高粮食产量高、贡献大的生产队的社员口粮标准，受到干部和社员的欢迎。

今年，兴隆公社农业获得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公社超额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兴隆公社党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纠正口粮分配上一律拉平的做法，实行多产多吃，让社员从丰收中得到较多的物质利益，更好地调动社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公社党委做出决定，全公社以四百八十斤为社员口粮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粮食亩亩增产超《纲要》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定为五百斤；过“黄河”的生产队，定为五百五十斤；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六百斤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定为六百斤。对这一决定，干部和社员普遍感到满意，积极性高涨，决心继续努力，争取明年更大丰收。

发扬民主，年终分配搞得又快又好

江苏省赣榆县门河公社三庙大队充分发扬民主，今年年终分配搞得又快又好。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个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分配结果，社员平均每人分现金一百零四元五角，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八点五；分口粮五百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百五十斤，社员们喜气洋洋地当场领取了用红纸包着的现金。

今年三庙大队在同严重干旱斗争中夺得了丰收。大队支部认为，要使群众积极性持久下去，一定要搞好分配，而要搞好分配，又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分配工作一开始，这个大队就由社员选出代表，同财务队长、会计、贫协组长一起组成分配领导小组，清理工分、帐目，张榜公布，同时提出初步分配方案，交社员讨论。

粮食分配是分配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这个大队粮食总产量超过计划五万斤，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超产粮多少，留储备粮多少，社员吃粮多少，统统由社员讨论决定。第二生产队开始提出每人平均分口粮五百二十斤，留储备粮八千五百斤。交给社员讨论时，大家建议，队里的储备粮已经不少了，应把这笔粮食作为发展养猪的奖励粮。生产队采纳了社员的意见。分配兑现三天之后，全队就买进了二十头小猪。

今年年初，这个大队制定了出勤奖和超产奖的制度。在年终分配中，社员们对照规定，认真地进行了评议。全大队有一百六十个社员因超额完成投工任务得了奖，还有一百七十七个社员得了超产奖。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也有十四人得奖。

抓好认真执行政策的典型

安徽省天长县各级党组织通过抓典型，认真抓好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工作。

天长县今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但是由于全县干部领导广大社员同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夺得了今年农业丰收，粮食、棉花总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中共天长县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抓好典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把今年的年终分配工作搞好。

县委就如何搞好今年的年终分配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召开了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就今年分配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县委和各區、公社党委都选择了今年农业上增产、平产、减产等各种类型的队、生产队，搞了年终分配的试点。这些试点单位进行了“三清”(清工分、清帐目、清物资)，民主制订分配方案，评模发奖，召开分配兑现大会等工作，使各级领导手中有典型经验。目前，这些典型经验正在推广，全县的年终分配工作正在有计划地进行。

天长县今年由于抗旱开支经费较大，还有少数社、队不同程度地减了产，这是今年年终分配工作中的新问题。天长县委强调各地一定要分配得公道，按照党的分配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凡是增产的社队，都要力求做到使社员们在增产之年增加收入。少数因灾减产的社、队，也要通过抓收入或少提或不提留公共积累以及暂缓归还国家贷款等办法，使社员们不减少或少减少收入。在粮食分配上，县委要求各地一定不要超过欠粮粮。各地要积极配合国家分配的征、超购任务，认真安排好社员口粮和牲畜饲料粮。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立法工作要加速进行。

保证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哈生别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公报》指出，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制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是不能讲法律的，强调按法律办事，谁就是“无法抗辩”，而他们就是法的化身，在这种反动思想毒害下，有人错误地认为，在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法律只能管一部分人而不能管另一部分人，好象一部分人享有特权是应该的；违法乱纪行为也随而发生。

检察机关是执法机关，对法律负有检察和监督的职能，我们必须坚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特权和歧视。一个人不管他地位多高、资历多长、功劳多大，如果他犯了罪，就要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依法惩处，而决不能让他超于法律之外。

郭庆祺(大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公报》提出，检察干部要做到“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干部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患得患失，怕担个人风险。我们要学习王庆山“三老四严”的大作风，学习王铁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无限斗争精神，不惜依法办事，就同违法，为了忠于法律，不惜以身殉职。我们还应当学法懂法，执法守法，当懂法的内行，作违法的模范。

准确打击敌人 切实保护人民

参加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代表，学习全会公报提出的民主

与法制问题，决心努力加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之一)

鹤鸣①兄：

两次来信及附带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②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点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③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之二)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④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注意为盼！

顺候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之三)

鹤鸣兄：

十二月廿日的信及两篇文章⑤，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⑥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某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部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①鹤鸣是李达同志的号。

②刊物指《新建设》杂志一九五一年第三卷第六期。

③系一九五一年三月廿七日。

④爱晚亭是长沙岳麓山风景之一，一九五二年修复一新。李达同志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毛主席应李达同志之请，亲笔题了“爱晚亭”三字。

⑤指李达同志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两篇论文。

⑥“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见胡适《实用主义》一书。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一九五五年李达同志在汇编《胡适反动思想批判》一书时，将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用和效果，以及与辩证唯物主义大体同样的名词都作了比较说明；对“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也作了明确的批判。

(原载《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

(一)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毛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随同接见的人员中有地质学家李四光。人们看到，毛主席俯身坐在李四光的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随后两人一前一后，在代表们面前走过。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主席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和李四光手拉手地走进休息室。

当时正是林彪、“四人帮”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时候，毛主席这种亲切地对待李四光，使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们很受感动。

事后，李四光激动地对人说，那天毛主席凑到他耳边问的是“身体好吗”。

进了休息室，毛主席请李四光在身旁坐下。那次会议，谈话内容很广泛，涉及天文、地质、天体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主席说：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的还有点道理。我大不相同地相信你的说法。告别时，毛主席殷切地对李四光说：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回到家里，这位已经患病、年近八十的科学家，由秘书记录他的口述，日夜赶写了《天文地质古生物》文集共七卷，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很早就研究过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李四光，开头就问：你这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很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注意到了地质力学这样一个专门性的概念。他详细地给毛主席讲了在力的作用下，大地形成的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主席对我国的石油资源情况很关心。一九五三年的一天，毛主席把当时担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周总理和朱德同志也在场。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毛主席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离不开石油。要是找不到天然石油，我们就要走人造石油的道路，可别耽误了！

李四光谈了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这个问题的考察情况，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中国的地质条件很好，问题在于我们的勘探工作要跟上去。我主张广泛地开展石油普查工作。

毛主席很重视李四光的意见。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开发我国石油资源的指示。周总理说：我们的石油发展很落后，首先是资源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

毛主席和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 顾迈南

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和石油科学工作者广泛开展普查勘探工作，先后找到了石油。毛主席对这项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九六四年元旦，毛主席邀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两人坐在一边，边看边谈话。当谈到我国发现石油时，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功劳。在三届人大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再次表扬了这项成就。周总理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的理论发现的。

我国其他许多科学家同样很受毛主席的尊重。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在日记中谈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和他和毛主席在一起见面的情况：“毛主席电话要我到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记者按：即李四光）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卧室摆满图书……。与我握手后，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文，我说明这是去年在杭州地理学会上所提的论文……。毛主席说，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尚有缺点，还应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钱学森来，大家就谈地球形成之初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谈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仲揆谈到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我近于否著作可以送他看。三点告别。”

竺可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送去了自己写的论文《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一书。

(二)

毛主席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重视科学研究成果，总是号召我们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毛主席亲自召开会议，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的发展问题。地质学家李四光带着铀矿石，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带着测量放射性物质用的仪器来到中南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我国原子能科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科技界的许多老干部和老科学家认为，一九六六年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

经党中央批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本刊这一期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给哲学家李达同志三封信的影印手迹。

这三封信的内容是商讨哲学问题的。它包括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修改意见，对李达同志的著作的评价和修改意见，以及对哲学普及工作的建议。此外，显然还应该把通过亲切的和商讨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在理论工作中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看作是这三封信的重要内容。我们相信，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从这三封信中将会受到许多启发，将会在改进我们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方面，获得很大教益。

—

大家都知道，《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这两篇著作中，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并用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包含于这两篇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四十多年来，成为指导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它的伟大的作用和意义，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并将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得到验证。

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反复指出的那样，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科学总结，《实践论》和《矛盾论》也有自己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从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到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两篇著作不仅在文字、提法上，甚至在某些原理的概括和表述上，都曾几经修改和补充；而每一次修改，都使得它更加精确，更加完善。但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从来都不满足于已经达到的研究成果，不认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完整无缺的了。直至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还曾谈到，他认为应该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改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只是由于实际工作太忙，这个令人神往的愿望未能实现。毛泽东同志对待自己著作的这种科学态度，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

现在发表的这三封信，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这种科学态度的具体材料。信中提到，《实践论》和《矛盾论》各有一处要作修改。一处是关于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评价，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另一处是关于一条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问题，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毛泽东同志对待自己著作的科学态度表明：不但对于具体事件的分析 and 评价，要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力求准确和符合实际；而且对于哲学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也应该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地使之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不能违背的。

这话的意思是：必须遵循普遍原理的精神实质，服从它所反映的客观规律。而不应该理解为：经典作家关于某一普遍原理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不能改动的；普遍原理不需要再丰富、发展了。这种理解，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不符合经典作家研究和创作的实际情况。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他们都对自己著作不断修改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完全反对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们自己不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著作，当然也不会同意别人这样去对待他们的著作。

将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运用到研究工作中去，就会导致封建社会经学家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其结果只能是使思想僵化，理论停滞，扼杀一切有生气、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它所产生东西，不过是些充满因循反复、繁琐注释、词句衍绎之类枯燥无味的文章。这样的东西，既不能掌握群众，也不能指导实践。要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恢复生气，要使我们的哲学园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就必须彻底地抛弃这种经学家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学习我们革命导师的榜样，坚持和发展他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缜密的革命学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敢于和善于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在阅读毛泽东同志这三封信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觉到，亲切的和商讨的语气，充盈字里行间，一种在理论研究中以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跃然纸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非常仔细地读过李达同志的文章，甚至发现了个别文字上的笔误；对整个作品既有热情的赞扬，又认真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凡有所修改，则出之以商量的口吻；希望对方去做的事情，则采取建议的方式。这一切，充分地表现出尊重别人，尊重他人的劳动，尊重人家的意见的平等精神。

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在理论工作中，要平等待人，与人交心，以理服人；一贯反对摆老资格，摆官架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或势压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主张要服从真理，绝不提倡盲目地服从权威。在真理问题上不能搞特权，这就是说，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科学问题上，只能以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来衡量，而不能利用的什么来衡量，例如以权力大小、地位高低或他东西来衡量。这才是理论工作中的平等态度和民主精神。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都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来保障。在理论领域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就不会有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当然，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制度方面健全起来。但是，民主原则，民主精神，也应该体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我们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上。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

打倒“四人帮”之后，理论界已经出现了新局面，学术讨论有所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进行得比较正常，这是学术繁荣的好征兆。（下转第四版）

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毛主席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写的一篇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的文章，很感兴趣。这年的八月二十四日，他把他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还有于光远同志请到家里，就这个主题进行了热烈交谈。

毛主席谈笑风生地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无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又说：现在我们许多事情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

谈话中，毛主席还着重阐述了“人间道路是沧桑”这个哲理。他说：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牛顿力学到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中外科学家热烈讨论了毛主席的这一哲学思想，我国的物理学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到现在，各国科学家已经陆续发现数百种基本粒子，证实了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的正确性。一九七七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会议上，一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建议，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或“部分子”等等这一物质层次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

早在一九四〇年，毛主席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一九六三年又把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在同年十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毛主席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毛主席答复说：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一九七三年毛主席接见美国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杨振宁说：“毛主席，您把科学实验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反问说：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主席在世时，对我国科学家的成长和进步极为关怀。解放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是同毛主席的关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国科学家缅怀伟大导师毛主席，表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科学实验，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尽快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本报有删节）

研究医学的人总要探究某一种病症的来历。本文的题目一定会使得许多搞医学的同志瞠目不知所措。查遍医学辞典、内外科大全，哪有“恐右症”之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疑难病症呢？是一种稀有的地方病，还是一种新发现的罕见病？其实它既不稀少，也并非罕见，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过，它并不是什么生理上的病症，而是一种政治病。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

那么什么叫“恐右症”？这种病症有什么特点呢？打个比方，中国有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说的是一个人被蛇咬了以后，对蛇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害怕心理，以至于看到了井绳，也以为是蛇，惊恐万分。这可以说是一种“恐蛇症”。被疯狗咬过的人会得到一种“恐水症”，看见水老害怕。所谓“恐右症”，恐的内容和“恐蛇症”、“恐水症”不同，其为恐惧一，都是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种现象产生病态的恐惧心理。“恐右症”者，老怕犯右的错误、出右的偏差之谓也。这种病的患者对“右”字特别敏感、特别忌，以至于闻“右”色变，达到了病态的地步。有这种病的人为了表白自己并无“右倾顽症”，凡事“左”三分，宁“左”毋右，明知“左”得不近情理，也在所不惜。因此，这种病的特点，是用“左”来堵人的嘴，涂上“左”的保护色，以免授人以右的口实而致攻击。

症状已清，按照医家的惯例，就要进一步探究它的病源。有人说，这种病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的结果，是他们棍子打出来的。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确实是这种病症蔓延的一个诱因。林彪、“四人帮”推行一种假左真右的两面政策，他们提出了一种荒谬的逻辑：“左”就是革命，越“左”就越革命，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可喜的现象：各级领导干部努力钻研业务，争当内行。一些又红又专的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开始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富有生产经验的工人和农民被选为车间主任和生产队长。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支又红又专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挥员队伍，已经开始成长壮大了。

为了使这个成长壮大过程发展得更快些，有一块绊脚石必须搬开，这就是“四人帮”所创造的一条“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条“普遍规律”，当年是他们“回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大棒，如今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作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

按照这个“普遍规律”，领导内行的必须是外行，这才能体现“党的领导”。倘若领导干部是个内行呢？“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同上）用公式表达出来就是：“外行=党的领导”，“内行=走资派”。根据这个“规律”，军队的领导必须是不会打仗的；工厂厂长必须是不懂生产的；科研单位的领导必须是不懂科学的。反过来讲，如果有个单位的领导是内行，那就违反了“普遍规律”，因此必须打倒，换上一个外行。比如说，让白卷小丁当了教育部长，去领导教育工作，这就符合“普遍规律”了。

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怎样被“四人帮”奉为“普遍规律”，明火执仗，到处推行呢？

这要回顾一下我国的特殊的历史情况。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技术落后。这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到我们党内。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的主要精力当然不可能放到科学技术上来。因此，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都很贫乏。在进入建设阶段的时候，面临工农业、文教科技等等的新问题，不少同志当时确实是个外行。但是，这就不能领导各行各业了吗？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在政治上是内行。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2页）从政治上讲，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尽管我们对某些技术和业务的知识比较贫乏，是外行，但党仍然能够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从政治上团结大家，调动各种人材的积极性，使他们发挥专长，做好工作。但是，不能业务，毕竟是这个缺点，不能老是停留在外行的水平上，甚至以不懂为光荣。因此，毛泽东同志反复教育全党，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各行各业的工作，必须成为内行，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适合这种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同上第144页）可见，毛泽东同志既肯定了在外行上能够领导内行，又教导我们的干部必须成为内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人帮”为了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为了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在外行与内行的问题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割裂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条“普遍规律”来禁锢人们的手脚。这笔帐至今还没有清算。其实这条“规律”完全是伪造的。靠摘引片言只语来唬人，原是“四人帮”的看家本领。可惜他们“发现”的这个“普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实在找不到一点点“根据”，于是只好含糊其辞地诌出什么“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如何如何。至于“唯物辩证法”怎样“看”出这么一个普遍规律“来”，那些低能的秀才们没有交代，也无法交代。因为客观世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规律”，所以唯物辩证法也不可能“看”出这么一个“规律”来。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虽然找不出“四人帮”用来吓人的那条“普遍规律”，但是，批判这种谬论的东西倒是很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反复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并且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说空话的和当官僚老爷的共产党员。列宁说：“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证明自己能善于把家们的工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们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在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75—476页）列宁的话多么深刻！必须揭穿“四人帮”打棍的那条“普遍规律”，打破这个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努力学习，钻研本行业务，变为外行变为内行。

必须指出的是：现在，这个“普遍规律”还在束缚一些人的头脑。更为严重的是：有少数人仍然拿着这条“规律”在那里霸占着领导者的位子，阻碍四个现代化的脚步。他们自己不懂，不学习，又不听内行的意见，仗势手中权力瞎指挥。也有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拿着这条“规律”作为保护自己乌纱帽的法宝。管你什么四个现代化，反正我已经住进了“常委楼”、“书记院”，孩子早就安排到了最显赫的所在，何苦去当内行呢？上级来检查吗？”“‘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嘛群众不满意吗？”“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显然，这个“普遍规律”确实是四个现代化路上抱块不小的绊脚石。我们要搬开这块石头，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如果有谁还要抱住这块石头不放，我们在说服无效之后，就要请他靠边站，不能让他挡住我们的路。

“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

余思

最“左”就最革命。于是，凡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同志，凡是不那么极“左”、跟不上林彪、“四人帮”的“左”的调子的同志，就会一律被林彪、“四人帮”目为右倾，而受到大棒加身、罪及妻孥、祸及亲朋的厄运。这种情形怎不令人闻之色变、不寒而栗呢？林彪、“四人帮”对于“恐右症”的流行是不能释其替的。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却并不是“恐右症”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之前，这种病症就已经存在了。大家还记得，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流行着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当应当反“左”，只应当反右，因为“左”是认识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左”对于社会主义并不可怕，而右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唯一险症。这种理论无以名之，姑名之为“‘左’比右好论”吧？这种“左”比右好论是“恐右症”的主要病源。由于这种理论，人们对于“左”丧失警惕，甚至故意宁“左”毋右。因为“左”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左”是要革命的表现，即使有人因“左”而犯了严重错误，也很容易得到谅解，甚至毫不影响使用、升迁。而右则不同，右之为恶其罪大焉。

一个人一旦犯了右的罪，被加上右的罪名，就住往一辈子翻不了身。于是人人恐右，恐右的结果是争“左”，恐右争“左”。一时成了一种社会心理。

这种“‘左’比右好论”有没有什么根据？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已经否定了一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右的错误是致命的，而“左”的倾向是无所谓的；右倾是险症，需要重视，“左”倾是疥癣小疾不足挂齿。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对于“左”的为害丧失警惕，“左”和右一样，都有可能使我们亡党亡国。

多少年来我们吃足了“左”的苦头，为了这种“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横行，而且横行得那么久，他们那些假左真的反革命路线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这种“左”。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最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由于他们看到那种“左”比右好论”相当有市场，就接过这个口号并加以大大发展，结果就变成越“左”越革命，最“左”最革命，他们自然是最“左”的，当然也就成了革命的化身。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然而他们是投“左”之机、靠“左”起家的，如果没有“恐右症”，没有“‘左’比右好论”，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就很难畅行无阻。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自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假左是有区别的。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的“左”倾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并且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来为它辩解、开脱了。

有一种论调值得研究，似乎“左”倾顶多只能算机会主义，却不能叫修正主义，而只有右倾才是修正主义。这是“‘左’比右好论”的一种理论根据。其实这种说法是大成问题的。先看事实：谁都知道，托洛茨基长期是以“左”为标榜的，尽管他右得不能再右，以至后来终身与马列主义为敌，与苏联人民为敌，但他仍不失为“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种机会主义难道不就是修正主义吗？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既可以来自右的方面，也可以来自“左”的方面。我们如果不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能命定地来自右的方面，也不能认为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算修正主义。

从认识论方面讲，右倾机会主义也好，“左”倾机会主义也好，都是使认识和实践相脱节。凡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认识老是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不敢采取必要的行动，就会出现右。凡是认识超越了客观

条件，跑到客观实际的前面，盲目地采取行动，就会出现“左”。因此，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从认识上讲，都根本违反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修正。我们怎么能说，认识落后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认识超越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呢？要在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这两种形式中分出好坏，比个高低，是很可笑的。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许多过“左”的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例如，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仅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始终都是十分尖锐的。这种观点表面上很“左”，很革命，其实不然。因为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果真始终存在而且始终那么尖锐，而不是经过长期的波浪起伏，逐步趋向缓和以至最终趋于消失，那就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正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趋于消亡为前提的。上述这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的否定，也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这种难道还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吗？这些年来，象这一类从“左”的方面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难道还少吗？

总之，“‘左’比右好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左”的为害一点也不比右小，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同样是修正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要防止来自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要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赤裸裸的右的口号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识破，而貌似革命的“左”的口号比较能够蛊惑人心，能够迎合某些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人的嗜好，因而往往能够俘虏很多人，为自己赢得不小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防止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一项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战斗任务。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历史研究》评论员

驳“‘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少民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到处设置“禁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因为他们用来确定儒法斗争性质的根据，所以也成了“禁区”。

今年十月间，我国历史学界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突破这个“禁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封建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封建制的残余，有待我们去彻底肃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在什么时候怎样转变为封建社会，正确地认识封建社会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规律和特点，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直接关系到古代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它是学术上一个大问题。五十年代，我国历史学界从热烈向题讨论开始，展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激烈讨论，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本来应当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可是这次讨论会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武断专横，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古史分期问题毛泽东同志已下定论，不容许继续讨论了。事实证明完全是他们在用流言来推行自己的邪说。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一九四〇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又阐述这个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

的《别了，司徒雷登》，文中又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自己领导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主义’思想的人，那真是错误了。”可见一直到这时，毛泽东同志还是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但是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说，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道理。从赞同西周封建说到赞同郭沫若同志的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他虽然认为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有道理，但并没有说过，到此已经穷尽真理，不必再行研究和讨论了。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过话，就成为最后的定论，把不同意见这个“左”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末郭沫若同志提出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反对西周封建说，岂不是也要被引伸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么？这显然是最荒谬不过的逻辑。同样，毛泽东同志虽然赞同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也不能因此便引伸开去，凡不同意郭沫若同志

的分期说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对历史的认识，往往由于材料不足或者新材料的发现，或者对已有材料出现新的解释而不能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因此，轻率地宣布某一看法为定论，只能妨碍自由讨论，而无助于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在艺术问题科学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由讨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派别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的论断可以判断出来，把他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视为“定论”，用作禁止自由讨论的口实，恰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古史分期问题象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各种学派都有权利以平等地位进行讨论。有些同志对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或者对另一学派的分期说，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现象，不能认为是对郭沫若同志或某

人意见的不尊重。郭沫若同志本人曾经多次修改他的分期说，直到去世之前，还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探索真理终生不倦的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在古史研究领域里，有人偏重于文化典籍的研究，有人偏重于考古文献的研究，或者有人偏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无理的反对。人生有限，知识无限，科学工作者能在任何一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总是难能可贵的。在探索过程中，意见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不是坏现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从历史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要有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几乎无不是在经过长期讨论通过知这种种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本报有删节）

《历史研究》第十二期简介

本报讯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出版。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本期发表了解放军政治学院林然昌的文章《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文章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那种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肯定过的都不能变动的主张，实际上是提倡一种教条主义，它直接违反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原则。认为革命导师的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不是宣扬什么怀疑论，而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本期还以《冲破“禁区”百家争鸣》为题，综述了《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最近在长春联合召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情况。这次会上，主要提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六种不同意见。

丁志志的《儒学的变迁》探讨了儒学的创建、分化、神学化、哲理化和儒学统治的覆

灭等问题。文章指出，儒学何以能够绵延达二千多个世纪之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第一次致命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林铁钧的《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认为农民军根据当时清兵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采取联明抗清策略，是正确的；不同意把农民军联明抗清策略说成是投降主义的看法。黄彦的《太平天国有一个“革命的哲学思想体系”吗？》，指出太平天国领导者宣扬宗教神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而上的学，不同意有些作者所谓太平天国存在着一个与封建统治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革命哲学思想体系”。

本期还发表了杨小佛的《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沈宗英的《略论罗法国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香港大学中文系单周荣的《《有教无类》“古解”质疑》，马非百的《杜仓相秦考》，陈崇武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究竟是何时提出？》等。又《历史学》季刊将于明年第一期出版。

热烈欢庆三中全会胜利闭幕

决心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妇联和政协妇女组举行迎新联欢会

邓颖超同志向大家祝贺新年康克清同志讲了话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全国妇联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妇女组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新联欢会。首都妇女界知名人士四百多人欢聚一堂，互相祝贺新年，热烈欢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决心在新的一年里紧紧跟上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邓颖超，全国妇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雷洁琼、黄甘英、林丽福、阿沛·才旦卓嘎，政协全国委员会妇女组副组长李文宜、关瑞梧、蹇先任，出席了联欢会。

联欢会由罗琼同志主持。

康克清同志在会上讲话。她说，正当我们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党中央决定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遗愿，也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和我们广大妇女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康克清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指出这一大好形势的取得是和广大妇女的努力分不开的。她希望广大妇女继续努力，在新的一年里使自己的思想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冲破各种禁区，破除迷信，打破陈规，不断创新，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并为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贡献。康克清同志说，为了鼓舞各条战线上妇女的积极性，表彰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妇女，全国妇联明年将在全国范围内表扬“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单位”。为了引导妇女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宣传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我们还准备召开全国幼托工作会议，努力解决男女职工的子女入托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精心培育后代。

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雷洁琼，女科学家张树枚也在会上发了言。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电影演员于蓝、京剧演员李世济即席表演了文艺节目。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第五幼儿园、北京实验二小、光明幼儿园的学生和小朋友演出了音乐、歌舞节目。

联欢会结束前，邓颖超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祝贺新年。她说，我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聚会，心情格外愉快。我经常用“人老心红志坚，革命永向前”要求自己，我愿意把这一志向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同志们，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出席今天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章蕴、常委卫立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以及首都知名女科学家、女教育工作者、女卫生工作者，科学家的夫人，在京的政协女委员，各界爱国知名人士的夫人，在京的女华侨和侨眷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全国妇联书记、在京常委、执委和北京市妇联的负责人林兰英、王承书、王雪莹、韩幽桐、于立群、王蒂薇、陈淑、王立芬、张宗英、胡子英、夏之栩、傅学文、何连芝、薛明、郭治平、谢冰心、王人美、杨秋珍、沈性元、林月琴、曹秀清、刘芸生、果素英、张素我、谢雪萍、周盼、林明美、章瑞英、胡德华等。



全国妇联和政协妇女组举行迎新联欢会。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出席了联欢会。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对外友协举行电影酒会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电影酒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以及驻该处官员应邀出席。出席电影酒会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王炳南等。宾主观看了影片《阿诗玛》。

(上接第二版)但是，这只是好的开端，好的起步，距离达到真正繁荣兴旺的局面还很远。他们还要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尚未肃清，社会主义民主的习惯尚未养成，封建特权观念的烙印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之深，一些人对于正常的批评和争论，总感到不适应，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理论问题的做法，仍然存在，那种在发生分歧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自以为是居要津，高人一等，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甚至凭借权力和地位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也不会马上根除。因此，要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民主作风，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三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时代，已经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正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用无产阶级世界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是帮助人们实现改造世界这个历史任务的重要手段。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工作。在给李达同志的信

中，毛泽东同志就一再强调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二十多年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经过广大哲学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哲学普及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事实表明，群众在领会和掌握《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方面，已远非解放初期可比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用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会了唯物辩证地对待工作，分析事物，一分为二地解剖自己，评价别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如此的普及，人民群众具有这样高的哲学思想水平，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由于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甚至把哲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搞乱了；通俗化变成了庸俗化；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单方面的实用主义。由于他们推行的那套形而上学、实用主义货色的影响，大大损害了哲学通俗宣传工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学习哲学理论的积极性。广大哲学工作者对此都有深切的感受。

因此，我们在目前的普及工作中，特别要注意贯彻完整、准确的原则，正确地解释原理，又要正确地联系实际。

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哲学精神和民主作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就要求有准确的概念，系统的论证，并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向前发展。只有做到完整、准确，才能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只有正确地解释原理又正确地联系实际，才能恢复哲学通俗宣传工作的威信，取得群众的信任，唤起他们学习哲学理论的兴趣和热情，启发和引导他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的武器。为了在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很需要对我们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以便改进工作、提高质量，不辜负毛泽东同志生前对我们的期望。

全国人民正在心一意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哲学工作者也要以优异的成绩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三封信，更好地发扬哲学精神和民主作风，则是我们做好理论工作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证。

(原载《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

我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将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三日电 解放后我国编写的第一部汉英词典——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写的《汉英词典》，最近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汉英词典》是一部中型语文学工具书，共收入汉语条目五万七千多，其中单字条目六千多，多字条目一万一千多。这些汉语条目以现代汉语为主，也收入一些常见的文言词语、方言词语、成语、谚语，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常用词语。对这些汉语条目，词典用现代规范的英语进行释义。英语的释义力求准确、简明，例证力求实用、丰富。词典的所有英语释义，都力图反映出汉语的语体特点。

这部《汉英词典》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开始编写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它的主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吴景荣教授。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舟桥孝夫等日本朋友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董事舟桥孝夫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谢丰泉摄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董事舟桥孝夫一行。

会见时，廖承志副委员长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在电子工业方面的合作，并重申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对松下幸之助先生访华的邀请，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会见时在座的外贸部副部长崔群等。

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哲学精神和民主作风

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很需要对我们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以便改进工作、提高质量，不辜负毛泽东同志生前对我们的期望。

全国人民正在心一意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哲学工作者也要以优异的成绩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三封信，更好地发扬哲学精神和民主作风，则是我们做好理论工作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证。

(原载《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

一批西藏古代医学、天文学和民间文学书籍出版

据新华社拉萨十二月十九日电 西藏正在出版一批有关西藏古代医学、天文学的著作和藏族民间文学作品。

西藏古代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即将出版精装和简装两种藏文版。这部西藏医学史上的著名古典文献，对人体生理学、病理学理论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药物制作都有论述。它最早的版本是公元八世纪由宇妥·元丹贡

王新元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陈云廖承志胡厥文谷牧康世恩等同志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原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党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王新元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王新元同志追悼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胡厥文，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央组织部、政协全国委员会、轻工业部送了花圈。胡厥文、康世恩、胡子昂等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主持，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致悼词。

悼词说，王新元同志是湖南省长沙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王新元同志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勤奋学习，深入调查研究，钻研业务，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王新元同志生前友好朱学尧、张劲夫、沙千里、孙大才、连贵、卢绪章、王芸生、罗叔章、卢晓村、孙超孟、李开信、赵朴初、屈武、曹瑛、韩培信、夏之栩、杜子端、余建奎等，以及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

任吴景荣教授。

天气趋势，帮助农牧民了解这一年年何时播种，有无旱情和水灾，庄稼成熟时有没有霜害，牧区冬季的风雪是大还是小等情况。《西藏算天文学基础知识》就是一本介绍如何运用西藏天文学知识来观测天气的通俗读物。

西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优秀民间文学作品《猴鸟的故事》以及藏族民歌《格桑啦》，受到广大藏族汉族群众喜爱。

柬埔寨军队在蒙多基里狠揍越南侵略军

意统一共产党和挪工人共产党(马列)谴责越南侵柬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十二月二十七日广播,柬埔寨游击队和革命军在蒙多基里省用土制武器和新式武器狠狠打击越南侵略军。

广播说,十二月初,越南侵略军一个团的兵力,秘密地进入了蒙多基里省的达丹地区。敌人一进来就掉进了柬埔寨游击队在那里挖的陷阱,踩上竹签,森林里一片哭叫声。游击队听到敌人的哭叫声,就跑过去打击他们,消灭了一批敌人。残敌逃跑时,又落入陷阱,踩上

竹签,又被打死一批。游击队缴获一批步枪、手榴弹等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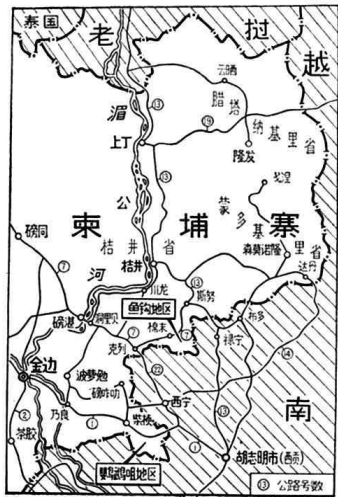
新华社罗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意大利统一共产党最近在米兰举行集会,讨论柬埔寨抵抗越南侵略的形势问题。发言者指出,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是对柬埔寨的国家独立和对东南亚的和平的威胁”。意大利统一共产党总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在法国的民主柬埔寨爱国者委员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越南不是不结盟国家,

它是扩张主义的,屈从于苏联的。”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十二月二十二日电 奥斯陆消息:据挪威报纸《阶级斗争》报道,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十二月十八日发表声明,号召挪威人民加强同民主柬埔寨的团结,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

声明说,柬埔寨共产党和政府发出警告,越南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旱季入侵。越南军队已经侵入到柬埔寨的境内。

声明说,新近宣布建立的所谓“解放运动和流亡政府”是“越南人和一小撮吉斯卡林分子在越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是进行入侵的政治上的准备”。



摩洛哥首相奥斯曼说

中美建交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决定性转折

新华社拉巴特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摩洛哥首相、全国独立人士联盟主席艾哈迈德·奥斯曼最近说,中美建交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他说:“我们祝愿这一事件为开辟国际缓和和合作以及增加共处的内容作出贡献,以有益于人类。”

奥斯曼首相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拉巴特举行的全国独立人士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他在谈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前不久对美国的访问时说,这次访问“加强了摩洛哥和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里的合作”。

布迈丁总统逝世

新华社阿尔及尔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报道,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三点五十五分(当地时间)在阿尔及尔逝世。

布迈丁总统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推翻本·贝拉政权后担任国家元首的。

布迈丁总统得病曾在今年十月初前往苏联治病,十一月十四日从苏联回国后,病情恶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东南亚和日本报纸关于越南的论述

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而不论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始终将我们的民族利益置于优先地位!

越南:国家建设发生动摇

日本《朝日新闻》最近刊登该报驻曼谷特派记者小川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越南:国家建设发生动摇》,摘要如下:

据驻曼谷的联合国组织最近推测表明,在九、十月月份遭到洪水袭击的越南,损失的粮食相当于起初估计的两倍,达三百万吨。为此,该国已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粮食危机,“即使饿死人,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

据这一组织估算,今年缺粮将达四百万吨。据外交人士透露,在受灾严重的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在每人每月配给的九公斤粮食中,仅有一公斤大米,有的地区连大米也配给也停止了。

大米的价格高达政府收购价格的二十倍,农民隐藏大米的行为也非常严重。为此,最近政府开始采取了强迫缴出大米的措施。但听说也出现了农民进行抵抗的行动。

工业也严重地陷入停滞状态。今年的增长目标原

声明说,越南党的领导人(在越南)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每天有成千从那里逃离,而且不断发生反饥饿、反压迫和反对发动侵略柬埔寨战争的斗争。

声明号召挪威一切进步人士加强同柬埔寨的团结,参加和组织各种抗议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示威游行。声明最后高呼:“苏联和越南从柬埔寨滚出去!”

“加强与民主柬埔寨的团结!”

鱼钩地区

是指柬埔寨东部大邦港省东部与越南西宁等省接壤的一块地区。该地区包括从斯努一棉来一部分的七号公路以东部分。其形状似鱼钩,故称“鱼钩地区”。越南当局一九七七年底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后,多次入侵这一地区。

鸚鵡嘴地区

“鸚鵡嘴地区”,是指柬埔寨东部大邦港省东部的一些突出地区,与越南西宁、隆安、同塔等省接壤。其形状似鸚鵡嘴,长约六十公里,宽三十公里。越南当局一九七七年底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后,多次入侵这一地区。



久拉诺维奇主席谈经济成就和存在问题

明年工作重点放在稳定经济上



南斯拉夫为了加速发展农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首先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现在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图为“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联合收割机在收获小麦。

南斯拉夫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久拉诺维奇今天在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谈到南斯拉夫一九七八年的经济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他说:南斯拉夫“今年工业生产增长将近百分之四,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三以上,就业率增长百分之四,对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百分之十一,职工的实际个人收入约增长百分之六,国际收支逆差比一九七七年有所减少,经济部门的亏损额也有所减少。”

他说:“今年由于气候条件不利,农业生产有所下降。尽管如此,除玉米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商品储备仍然能满足我国居民对食品的需要,有些产品还能出口。”

久拉诺维奇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前南斯拉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说:“由于消费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联合劳动组织的公积金减少了,联合劳动组织参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大大下降了,从而大大削弱了自治的物质基础。”

久拉诺维奇在谈到外贸方面的困难时说,南斯拉夫一九七八年的外贸逆差达到四十多亿美元,主要依靠非商品外汇收入来弥补。

久拉诺维奇对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克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他在谈到一九七九年的工作计划时指出,明年的工作重点将放在稳定经济上。他强调,今后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经济部门的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以增强自治的物质基础。明年的计划规定:社会产品将增长百分之六,其中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七,出口至少要增长百分之五,进口将增长百分之二。

哈比亚利马纳当选卢旺达总统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基加利消息:卢旺达总统选举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揭晓,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当选总统。卢旺达新宪法已于十二月十七日经过公民投票通过。

新的宪法将取代因一九七三年军事

政变而被部分中止的一九六二年制订的宪法。新宪法规定,执政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法由卢旺达唯一合法政党,党的总书记在总统一旦不能履行职责时成为总统的临时继承人,并不得对总统进行弹劾和起诉。

卡洛斯拉国王接见北京动物园小组

感谢中国赠送两只大熊猫

新华社马德里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中国国王卡洛斯拉国王和王后以及西班牙人民的两只大熊猫已经安全地在马德里动物园落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拉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萨苏埃拉宫接见了护送两只珍贵动物的以倪翌发为首的北京动物园小组。

卡洛斯拉国王对中国国王赠送的礼物表示感谢。他说:“我相信,马德里动物园的有关饲养员将会把中国政府和人民赠送给我们的这两只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那样来照料。”

在此之前,在马德里动物园举行了赠送仪式。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马晓鸣代表中国政府将两只大熊猫交给了国王的代表蒙德哈尔侯爵。

新华社马德里十二月二十四日电 一对名叫“强强”和“韶韶”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主任倪翌发和技术员叶群的护送下,于今天晚上乘专机平安到达马德里。

这对熊猫是中国政府在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拉和王后索菲娅今年六月访华期间赠送给国王夫妇和西班牙人民的。

也、中签订建设国际会议大厦议定书

据新华社萨那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九日在萨那签订中国援助也门建设国际会议大厦项目的议定书。

也门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赫纳杰和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杨福昌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驻也门签字。

们能够相信越南吗?》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日内瓦,越南大使武文充说,难民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离开越南得到官方鼓励的消息是不确定的。另外,越南副总理维赫在访问曼谷时承认有一个进行敲诈勒索的集团利用远洋轮船帮助越南难民外逃。他否认越南政府蓄意把它的人民赶出越南。

我们应该权衡一下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搞清哪种说法是真实的。难民们说,他们在被迫卖掉自己的财物后才得以离开越南,并说是官方的船只把他们乘的船拖到海外的。越南的这位副总理则说,有一帮诈骗分子在帮助难民外逃。由此看来,难民的说话和官员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是远洋轮船把难民的船只拖到公海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远洋船只是否是诈骗分子的。

在象越南这样的国家里,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伙诈骗分子,当局肯定是会知道的,而且是会设法消灭的,除非它不想这样干。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伙诈骗分子,越南当局知道而又允许他们继续活动,那么,就可以说越南当局是在宽容这种活动。

越南用这种做法把难民问题转嫁给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外逃难民的必经的地方。我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承担向难民提供膳宿的负担。



泄露天机

前些日子,越南当局施展“笑脸外交”,向东南亚国家抛出与东盟主张的“和平、自由、中立区”大不相同的所谓“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的方案,引起了东南亚公众舆论的警惕。人们纷纷问,越南当局的所谓“真正独立”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问题,越南当局一直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随后,河内偷偷地把“真正独立”缩短为“独立”,企图继续把这个方案卖给东南亚国家。

为什么越南当局一定要在东盟国家的“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中塞进“真正独立”、“独立”这一类字样?这个谜在得到了解答。

最近,河内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越南通讯社公布这个“阵线”的“声明”,提出了一条纲领,要把柬埔寨变成据说是“和平、独立、民主、中立、不结盟”的国家。苏联的宣传机器对此马上表示支持和“祝贺”。苏联的所谓“亚非团结委员会”为此发表声明,把“阵线”纲领中的“独立”改成了“真正独立”。

谁都知,这个所谓的“阵线”不过是越南为侵略柬埔寨而建立的一支别动队。苏联和越南对它的“独立”和“真正独立”的支持和“祝贺”,泄露了它们的天机。原来,苏联、越南嘴里的所谓“独立”、“真正独立”,就是要别人听从它们的指挥和控制。它们要已经获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再来一次“独立”和“真正独立”,就是要使这些国家变成象“阵线”一样的受它们驱使的傀儡。它们提出“独立”、“真正独立”的口号,不过是它们妄图实现从“印支联邦”到“亚非体系”的一个步骤。

苏联和越南的这种“独立”或“真正独立”的把戏,今天可以在柬埔寨上演,明天当然可以在别的东南亚国家出笼。对此,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一针见血地指出:“越南人建立了一个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我们担心,两年后是否有必要为东盟国家建立一些救国阵线?”显然,东南亚国家已经识破河内的诡计,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可以休矣!



越南在柬埔寨的假面具

印度尼西亚《战斗报》十二月十五日发表一篇题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假面具》的社论,摘要如下:

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争端,十一天以前随着自称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出现而加剧了。亚洲一些政治观察家把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看作是越南为它向柬埔寨地区发动攻势而制造的假面具。越南军队可以向这个阵线为幌子,随心所欲地向柬埔寨纵深地区发动攻势。

鉴于柬埔寨和因此所在地区离东南亚国家联盟所在地相当近,越南如果东盟五个成员国对于那里的事态发展给予关注,那是不足为奇的。

正在泰国访问并同泰国总理江萨会谈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明确地说,他与其支持在柬埔寨刚成立的解放阵线,不如支持柬埔寨政权。曼谷外交人士认为李光耀总理的谈话起码同泰国上江萨总理的态度相吻合。

我们希望通过此论坛希望柬埔寨同越南的争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这个争端如果发展到成为新的战争,它将严重影响保持到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范文同总理自己曾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曾多次提到——理应认真地予以恪守。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反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其内政受到别国的干涉。这个原则是保持良好关系与和平的关键之一。

此外,我们也想申明,我们仍然坚持同世界上所有

动乱和斗争锻炼了非洲人民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一九七八年，苏联扩张主义的幽灵，以气急败坏的神态和更加阴暗的心情在非洲大陆到处游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使非洲局势更加动荡不稳。非洲人民，硝烟弥漫；非洲腹地，干戈不息；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象两个毒瘤折磨着人们的精神和躯体；从印度洋、大西洋到地中海的非洲沿岸，苏联扩张主义的魔爪伸向一个个战略要地，争夺一处处战略资源，并企图控制一条战略通道，从而威胁着非洲许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非洲人民怎么办？是屈辱妥协、苟安偷生吗？不！他们继续高举团结战斗的旗帜，在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扩张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整个第三世界的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头脑发热的苏联扩张主义者从来不甘自己的挫折、碰壁和失败。一九七七年，苏联在扎伊尔、苏丹、索马里等国的侵略扩张活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在称霸非洲的野心驱使下，莫斯科在一九七八年却更加疯狂地加紧它的侵略扩张步伐。在东北非，它以空前的规模，把一万七千多名苏、古军事人员，四百多辆坦克、五十多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大量导弹和大口径火炮等价值十亿美元武器运进非洲之角。在今年二、三月对这个地区进行肆无忌惮的军事干涉。在中部非洲，它在继续残酷镇压、围剿安哥拉游击队的同时，五月间又策动千名加丹加沙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第二次入侵扎伊尔，企图在非洲中央突破，横断非洲。在南部非洲，它竭力插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通过提供顾问和武器进行渗透，同时在前线国家和各解放组织之间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它争夺势力范围的轨道。

据统计，在非洲的苏、古军事人员已有五万多名，分布在十六个非洲国家之中。非洲大陆沿岸被苏联控制和使用港口、机场、导弹阵地、雷达、军事通讯站等设施达二十多处。事实表明，苏联在一九七八年对非洲之角的连串攻势，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进一步暴露出这个后起的超级大国对外扩张的疯狂性与冒险性，也使它重演非洲进而包抄欧洲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

苏联在非洲之角之所作所为，同它在整个

个红海地区、波斯湾一带的扩张行径是紧密配合的，同它在非洲其他地区的活动也是互相呼应的。其意图是：通过对红海周围地区的军事占领，控制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通道，同时在南部非洲抢夺战略要地，以便在战时卡断西欧赖以生存的石油等原料的南大西洋运输线。扎伊尔报纸指出：“苏联向非洲这些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进攻，是为了吞并和控制它们，特别是把它们的通道置于它的监护下，从而从侧翼包抄欧洲。”

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活动采取了种种阴谋、毒辣的手段。其中最得手的一招是由它出钱、出枪，并用高价收买代理人作为它充当炮灰。近几年它在安哥拉、扎伊尔、非洲之角挑起的四次战火，都使用了古巴雇佣军作为它打头阵，而它却在背后策划。最近一年，古巴在非洲的军队又大量增加了，古巴整个军队的四分之一已派往非洲，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大的一支外来干涉军。这支军队为它所控制的国内派系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成为这些国家的“太上皇”。

苏联在非洲还竭力利用分歧，扩大争端，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例如，它挑动和加剧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争端，一会儿同这个“结盟”，一会儿又同那个签订“友好条约”，有打有拉，或先拉后打，或先打后拉，必欲使其听话而后止。非洲舆论对苏联这种卑劣的手段深刻指出：“大陆东部正在成为巫婆的一个永久沸腾着的容器，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战争和内战不断从这只容器中烹调出来，而俄国人和古巴人则忙于划定战略地区，以巩固他们的影响和军事存在。”

尤其可恶的是，苏联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为了拉拢一些人而打击一些人，可以随意给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贴上勃列日涅夫的“进步”或“反动”的政治标签。例如，对埃及、苏丹、索马里等国，苏联头目们一度秋波频送，笑脸相迎，竭力拉拢。但当它们为维护独立和主权而采取的原则立场触动了苏联扩张主义的利益时，苏联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把它们列入“反动政权”的黑名册。苏联还攻击红海和西非地区国家建立区域合作组织是拼凑“军事政治集团”，一再威胁说这些“小集团的建立迟早会招致与此对抗的联盟或集团的建立，并由此产生种种后果”。

谁都知道，苏联所谓“种种后果”，就是要对这个不听话于它的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在苏联唆使下，古巴雇佣军正蠢蠢欲动。苏联

在这个地区扩大侵略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苏联也是个很值得提防的“盟友”。苏联去年在安哥拉策划未遂政变，今年六月把埃塞俄比亚现政权的反对派头面人物秘密运进古巴驻埃使馆，都是发人深省的事件。

苏联在非洲的横行霸道，从反面教育了非洲人民，促使非洲国家联合起来同它作坚决斗争。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认识到，要维护国家安全，免遭苏联及其雇佣军的侵犯，就必须加强集体防御，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共同抗击和摧毁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在苏联大举干涉非洲之角后，红海地区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合作和联合防御，坚决保卫红海的安全。四月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十六国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安全问题，并通过了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在扎伊尔第二次沙巴战争发生后，十几个非洲国家向扎伊尔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六个非洲国家毅然派出军队，组成联合部队，同扎伊尔军队并肩战斗，终于将外来的雇佣军驱逐出境，制止了苏联在非洲中部的军事扩张，显示了联合防御的强大威力。

非洲人民的抗霸斗争，也得到一些西欧国家的同情和支持。非洲和西欧国家联合抗击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有新的发展。

今年以来，一些西欧国家向受到苏联干涉和威胁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

广大非洲国家认识到，要使非洲大陆保持稳定，就必须排除外来势力，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干涉。一年来，它们要求苏、古军队撤出非洲的呼声空前高涨。七月在苏丹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十五届首脑会议上，反对苏、古军队干涉非洲事务，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说：“非洲并不想排斥一副殖民主义枷锁套上另一副殖民主义枷锁”。这反映了非洲人民的共同愿望。经过充分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和建立非洲干预部队的决议。这对千百万在非洲谋取军事基地、蜜糖干涉非洲事务的苏联霸权主义者，不啻是当头棒喝。

斗争是艰巨的，道路是曲折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及其古巴雇佣军不会自动退出非洲，他们还会在非洲进行破坏和捣乱。然而，非洲人民不可侮。历史已经证明，他们能把老殖民主义者赶出非洲。历史还将证明，他们也能把苏联新殖民主义者赶出非洲。



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在写稿、改稿、收发稿件、传送图片、储存和查用资料方面，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编辑部一例。

（新华社稿）

北极熊态度何其蛮横

苏联领导人坚持霸占北方领土激起日本朝野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二日电 苏联领导人二十日再次向日本施加压力，攻击日本要求苏联归还日本的固有领土北方四岛“就等于放出战争的恶魔”。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书记苏斯洛夫二十日在接见飞鸟田一雄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就国际形势及日苏关系等问题讲了一番话。

据报道，苏斯洛夫说：“日本政府是不好的。说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这种无端的宣传和要求归还领土的运动，就是证明。”他说，日本政府提出归还固有领土的要求，“就等于放出战争的恶魔”。

苏斯洛夫的这番攻击日本的谈话，在东京引起强烈反应。据日本《东京新闻》二十一日报道，日本府内人士在二十日接见日本记者发表谈话驳斥说：“对于前往访问的客人说出这种话是十分失礼的。无论怎么说，北方领土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今后只能顽强地谈判下去。”

在这次谈话中，苏斯洛夫再一次推销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积极行动来使亚洲安全保障体系的精神固定下来。”他强调，“苏联将一如既往，站在越南一方。苏联同越南的友好合作条约是这种团结的证明”。

据新华社东京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以飞鸟田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第六次访苏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在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等问题上同苏联方面发生争执。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在苏联同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两次政治会谈。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日本社会党主张苏联归还被它所占去的整个千岛。苏联不但坚持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的老调，而且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提出新的领土要求等于放出战争恶魔”。对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评价问题，社会党主张赞成这项条约，而苏联“不同意社会党的立场”。另外，就如何对待苏联提出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问题，社会党主张“现在的内容不能接受”，而苏联却要求社会党“积极支持”这项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在会谈后是否发表联合公报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苏联极希望发表联合公报，在飞鸟田去莫斯科前，苏联就曾通过非正式途径向社会党施加压力说，“如不发表联合公报，就不欢迎访苏团”。社会党则不同意发表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公报。

中央歌剧院演出

音乐会

独唱：官自文 李小雨 李凤翔 楼乾乾 苏李欣 雷震霄

独奏：金纪广 曹欢

29,30日, 13,30日晚7,00

在天桥剧场

28日早10时售29,30日票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政治部话剧团演出

八场话剧

不准出生的人

编剧：王颖

导演：孙超群 孔西

主演：孙超群 孔西 隋年芳 张沂

12月28日晚7,00

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

不久前，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今后仍将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实现自卫合法民族权利的斗争”。这合唱了多年的滥调，在中东地区能够吸引的听众是越来越少了。广大阿拉伯人民，是从行动而不是从言论来判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的。他们根据切身的经验认识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如此猖獗，苏联起了不小的作用。

据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宣布，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七年，苏联向以色列先后输送了二十五万一千名犹太人，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苏联当局为此简化了犹太人离境手续，还应以色列的紧急请求，提供十万吨水泥，帮助解决“移民”的建房困难。勃列日涅夫亲自下令，“所有想走的犹太人都让他们走”。于是，成群结队的苏联犹太人涌向以色列。对于梦想建立“大以色列”而又苦于人力不足

苏联竭力使军事科研为扩军备战服务

为夺取全面军事优势争霸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电 苏联正在加紧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制造新式武器。据认为，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军事实力上全面超过美国，以争霸世界。

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的“科学研究费”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军事目的，为美国的二点五倍。军事科研人员迅速增加，苏联较高级的军事科研人员约为美国的两倍。十多年来，苏联疯狂地发展核武器和更新常规武器。目前，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已与美国势均力敌，而常规武器已占显著优势。美国原空军部长说：“在过去十年中，变化是十分惊人的。我们看到了苏联的一种可怕的势头。”

近年来，苏联军界头目极力宣扬加强军事科研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七五年，前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一书中就鼓吹：“不能削弱科学探索战线，要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来制造有发展前途的武器和技术兵器，缩短把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于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奥加尔科夫说，“重要的是，使现在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都能成为对发展军事的实际贡献，更充分地考虑到军事发展的前景”。

近几年，苏联在加紧研制新式武器过程中，正在把加导弹多弹头化，提高命中精确度，作为发展战略核武器的重点。这是苏联核力量在核武器质量上赶超美国，夺取全面优势的重要步骤之一。据美国《国民评论》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文章报道，一九六七——一九七五年的十年间，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开支以二点五之一之比超过了美国。苏联发展的第四代四种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全都可以安装分导式多弹头。现在，苏联正在研制第五代洲际导弹。在潜艇发射的导弹方面，苏联正在建造一艘可与美国三叉戟潜艇相匹敌的巨型潜艇“台风号”，它能发射二十到二十四枚新型导弹。从新型潜艇D1级上发射的SS—N—18远程弹道导弹，每枚携带三个核弹头，射程一万七千多公里，可从摩尔曼斯克海城击中美任何重要目标。这是苏联第一种供潜艇发射的多弹头导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随着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核弹头数量将增加一倍左右，而每个弹头的爆炸力将大大超过美国。

苏联也十分重视发展和更新常规武器。目前，苏联拥有各型坦克的数量比美国多三倍，装甲运输车比美国多近一倍。苏联海军舰只吨位虽不及美国，但舰艇总吨力大大超过美国，尤其是潜艇数量比美国多两倍。苏联海军已由近海防御力量发展成为远洋进攻力量，这是苏联继打破美国核优势后又一战略性变化。这也是苏联发展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已大量生产T—72新型坦克，并用来装备其驻东欧部队，占其坦克总数的百分之四十。T—80新型主战坦克已研制成功，用来对付美国XM—1坦克和西德的豹II式坦克。

苏联还在加紧研制各种战略轰炸机。目前除保持已有的“熊”式和“野牛”式远程轰炸机外，近年来，还加紧生产“逆火”式轰炸机。据报道，这种轰炸机“如果在飞行中加油，它们能够飞回美国并返航。据北约组织专家说，苏联正以每两个月生产五架的速度制造‘逆火’式轰炸机”。

苏联在发展军用卫星方面近十年也有重大进展。截击卫星系统是当前苏联军事科研的重点项目之一。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称：“苏联已拥有能用对付某些美国的作战能力。”

研制“不致无形除形”的武器是苏联领导集团向军事科研人员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所谓“不致无形除形”的武器包括大功率激光武器、气象武器、遥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等。据报道，“苏联对生物、化学武器越来越大的兴趣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极大忧虑”。

国际简讯

秘鲁发现两个大金矿

秘鲁南部的大马德雷迪奥斯省最近发现了两个大金矿，估计它们的黄金蕴藏量共达七十三万五千公斤。将有两百家中小企业在矿区作业，估计可提供五千个新的就业机会，生产价值近六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黄金。

东盟国家加强粮食互助合作

东盟大小组第三次会议十二月九日在菲律宾碧瑶市闭幕。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向会议报告了他们优先向东盟成员国出售大米的情况。非国家粮食局的报告说，菲律宾今年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口了八万九千三百吨大米。

东盟国家已拨出五万吨大米，作为东盟共同的储备，其中泰国和菲律宾分别承担一万五千吨和一万二千吨。

（据新华社）

一年。对此，以色列当局是感恩不尽的。特拉维夫

的官员踌躇满志地说，由于苏联犹太人源源不断地到来，需要在约旦河西岸

和加沙地带保留和扩建定居点。八月，以色列总理贝京宣布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再建三个定居点。

据美联社报道，约旦河西岸三个定居点中，有一个是接近以色列犹太人的。

据西方报纸指出，苏联把这种与犹太复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关系，视为自己中东政策“灵活性”的表现。其“妙用”有二：一是在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加强美国争霸中东的地位；二是保持中东的“不战不和”。当然，还有第三个“妙用”，这也许就是违反莫斯科的意愿的，那就是进一步擦亮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眼晴，看清苏联假支持、真出卖的伪善面目。

怀成波

特拉维夫的感激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不啻是“及时雨”、“雪中炭”。

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的十月战争期间，从战争爆发的当天六日至十，五天内苏联接二连三批共八百一十五人离境，他们搭火车到达维也纳，再登机直飞以色列，昼夜兼程，十万火急！以色列的苏联犹太移民协会主席萨拉·萨丁斯基夫人喜不自胜地说，苏联犹太人到，就“要求”参军，同阿拉伯人打仗。黎巴嫩《生活报》发表评论说：“显然，苏联在为以色列提供其战争所需要的士兵和人力。”评论指出，这就是苏联向阿拉伯人民表示的“友谊”的标志！

去年九月，在阿拉伯国家的倡议下，不结盟国家外长在联大